

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 专题文集

上 册

（内部使用）

河北省中共党史研究会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前 言

中共党史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大家比较关切的新领域。一九八四年九月,我们同军事院校石家庄协作中心一起,在石家庄举办了中共党史(社会主义部分)教员进修班,请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的同志们作了系统讲授。应各地党史工作者的要求,我会将这些讲稿编印成《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专题文集》(上下册),供内部使用。全书近七十万,较原估计字数增加约十五万字。

在印发过程中,中共河北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的同志们做了大量具体而繁重的工作。经费方面,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给予了协助。我们谨向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和上述单位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人力不足,时间又仓促,《文集》中错、漏难免,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河北省中共党史研究会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加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工作是当前一项急迫的

重要任务·····	金春明 (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几个问题·····	孙 良 (6)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林邦光 (21)
关于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问题·····	陈诗惠 (38)
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战线方面的几个问题·····	范守信 (50)
党的八大路线·····	孙 良 (63)
实事求是地评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	陈雪薇 (75)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和“大跃进”的失误·····	曲方明 (92)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及其历史教训·····	陈诗惠 (118)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魏维钧 (135)
评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党的思想文化工作 ·····	陈雪薇 (153)
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十年的成就·····	滑 隆 (182)

目 录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	(203)
关于“二月抗争”的几个问题·····	(222)
“九·一三”事件和周恩来同志纠“左”的努力·····	(234)
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和错误“批邓”·····	(253)
关于天安门事件·····	(272)
“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和经验教训·····	(288)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323)
党的十二大的伟大成就和历史地位·····	(359)
重新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深远意义·····	(376)
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398)

加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工作 是当前一项急迫的重要任务

(在石家庄党史教员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

金 春 明

今天，中共党史教员进修班正式开学。我代表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次进修班所以能够在石家庄开办，是同河北省有关部门，特别是高级陆军学校的领导重视和帮助分不开的。在今天的开学典礼上，又有这么多领导同志参加，充分说明河北省委和高级陆军学校对这次进修班的重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他们的衷心感谢！我们教研室的主任马齐彬同志，本来是要来出席这次开学典礼的，但临时有急事出差到上海，今天未能出席，他让我们代表他表示歉意，并表示尽量要抽时间到这里来一次，并给大家作报告。

我们这次进修班的内容是学习和研究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所以这样办，主要是考虑当前党史教学和研究实际状况。长期以来，军事院校、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校的党史教学，主要是搞民主革命时期。不仅在建国后的前十七年是如此，只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而且在打倒“四人帮”、结束十年内乱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是如此。最多也不过是讲到一九五六年。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从事社会主义部分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志逐渐增多，有关的材料和专题研究文章资料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是很好的现象。从前几年开始，党史研究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社会主义部分的观点已经被明确提出来，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同志赞成和响应。但是，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专门从事社会主义部分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数还很少，研究工作还处于开始的初创的阶段。较之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工作，无论就其队伍的规模和数量，还是就其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都相距甚远。当然，我的意思决不是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人员已经够了，问题也不需要再研究了，事实绝非如此。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还有许多研究课题有待继续努力。整个党史的研究和教学队伍都是迫切需要补充和加强的。但就比较而言，社会主义党史研究力量尤为薄弱，与当前的现实需要相距甚远，尤其需要充实和加强。

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起码有以下四点：

(一)对当前有更现实的借鉴作用。

历史的作用，就在于借鉴。用董老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察往知来”。董必武同志一九五九年视察中央档案馆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认为档案工作的作用在于：“创业扩基，前轨可迹。古为今用，功同史册。”而最后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察往知来”。研究历史是考察既往发生的事情，而目的在于了解现状，指导未来。这样一个意思的话，古今中外很多人都讲过。例如大家常引用的一句著名古代成语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在痛悼魏征时说的那三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里的第二句，以古为镜，就是以史为镜，知兴替，也就是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客观历史规律。革命导师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的重要工具。他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650页），列宁要求我们，“从今天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列宁全集》第八卷82页）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821页）那么，研究昨天和前天目的何在呢？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论述国民党的时候说：“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23页）研究过去的历史，就可以知道现在和将来。毛泽东同志用的是“知道”二字，可以说是历史的借鉴作用的集中而通俗的表述。这是所有的历史科学都共同具有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借鉴作用呢？第一，从时间上讲更切近，是属于刚刚过去的昨天。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亲身走过这一段历史，很多事情记忆犹新。这就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使人们可以通过亲身经历来学习。这样更亲切，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第二，从事物的发展上看更直接。今天很多正在从事的工作和解决的问题，都是昨天遗留下来的，是昨天工作的继续。不研究建国后的党史，就不能了解当前很多事物的发展历史，不能了解其来龙去脉，也不易掌握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这一点讲，建国后党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已经过去，但今天又存在着。这种直接性比其他时期的历史所不能比拟的。第三，从内容上讲更有共同性。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任务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所以提“全面开创”就是说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不是自今日始，过去已经开创了，只是不够完整不够全面而已。廖盖隆同志在大连党史讲习班上提出一个观点说，建国以后三十五年的历史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段：前七年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主的阶段，而后二十八年则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阶段。我感觉这种划分法很有道理。事实上，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经提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也做过多次努力，但可惜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因此，这二十八年中的正确与错误、胜利与失败、成功与挫折，无不萦记在我们脑海，与当前息息相关。我想，这是否可以说是研究这段党史

具有更现实的借鉴作用的理由。

（二）提供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搞任何工作缺乏必要的经验都是搞不好的。经验从哪里来，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只能从实践中来。正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7页）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是一样。

当然，作为经验来源的实践，不只是限于我们自身和自己一个国家。比我们先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国家的实践，他们的成功与挫折、成绩和缺点，会给我们以启发和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历史，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最主要的经验的来源，还是我们自己的实践，特别是建国以来三十五年的实践。

三十五年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发展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了。特别是因为在这三十五年中，我们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有过严重的挫折，走过曲折的道路，经验就更丰富、更可贵。单以经济建设而论，开国初期，我们就创造了在很短的时间里依靠党的正确政策和充分发动群众，迅速恢复遭受严重战乱创伤的国民经济的经验；接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坚持了革命和建设并举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比翼齐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企图依靠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勇猛冲击去实现“大跃进”，这种不成功的尝试，使我们付出了三年经济困难的高昂代价。挫折使我们清醒了一些，党中央正确地决定和实行调整八字方针，医治了重大的比例失调，使国民经济重新获得发展。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判断，又使我们犯了更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去“抓革命、促生产”，但实际结果是造成国民经济空前的大破坏，这个沉痛教训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

客观经济规律有一个特点：在平时经济活动比较协调地正常进行着的时候，它好象是不存在似的；但是，一旦人们破坏了正常的比例关系，违反了客观规律，那时它就要发挥作用，给人们以惩罚。因此，要认识和掌握客观经济规律，仅仅有正面的成功的经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反面的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同成功的经验相比，从失败的教训中总结提高的认识，往往体会更深，更能发人深思。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85页）现在，我们不但有了成功的经验，也有了失败的痛苦教训，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有了在正确方针指引下飞速发展的实践，我们的经验可以说是比较完备了。

今天我们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学习和研究这些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当前和今后的实践。而在完成这项任务当中，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工作，应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学科。

（三）对搞好整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整党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这次整党的任务就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其中统一思想又是完成四项任务的前提。统一思想，统一到哪里呢？就是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根本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主要是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的产物；是同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斗争的产物，特别是同“左”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产物。

建国以来，我们党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而其中作为主体的错误正如陈云同志正确指出的是“左”的错误。经济上“左”倾错误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上“左”倾错误的极端表现，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思想理论上“左”倾错误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这三者又是紧密相连，相互助长的。不彻底弄清这些东西，彻底否定这些东西，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肃清“左”的影响，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把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上来。而做不到这样的思想统一，其它三项任务就失去了完成的思想基础，这次整党就可能完不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可能走过场。

而学习和研究建国以来三十多年党的历史，就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作为主体错误的“左”倾错误，是在怎样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有那些突出的表现，以及它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造成多么大的灾难性的后果；就可以帮助我们真正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本质，并能够有说服力地去彻底否定它；就可以用大量的生动的事例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正确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党史科学在这次整党当中的积极作用。

（四）有助于理解和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里所讲的“长期历史经验”，当然包括整个中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外国革命的经验，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经验，是建国三十多年的经验。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向外宾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说：“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另一条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邓小平文选》361—362页）这里讲的都是建国以后时期的历史经验。

大家都知道，早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就提出了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但是，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必然要有一个距离，要有一个实践经验积累的过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只有一定量的积累才能引起质变。人们认识客观

规律的过程也是如此。建国以后，对于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很缺乏认识。从建国到毛泽东同志去世，搞了二十七年，逐渐有了一些认识，积累了若干经验，但并没有真正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同志去世后，我们又搞了七年多。在这七年里，前两年还是不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五年，我们的认识才比较正确了，因而社会主义事业也一年比一年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了这样一个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他说：“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邓小平文选》371页）

当然，仅仅是经验的积累一个条件是不够的。这是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但还要有一个重要的主观条件，就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这条正确的路线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党的十二大所以能够制定出明确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方针和政策，正是历史经验的积累达到了质变阶段的表现，也是我们的党中央科学地总结了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进行了深刻地再认识而得出的结论。既不是割断历史，用今天的改革否定过去的成就，例如因为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就怀疑甚至否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成就；但又不是停留在过去的结论上，以为那些结论都是完美无缺的。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躺在前人和别人的认识上，也不能停留在自己已有的认识上，而要依据时间、条件、地点的变化继续不断地认识。不断地发扬正确的认识，纠正错误的认识，增加新的认识，代替过时的认识。这样，思想才能不断地解放和前进。

所以，我们只要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不断地进行再认识，本着这样的精神去学习和研究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就一定会对正确认识和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里附带说一个问题：有的同志问，中宣部发的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的课程，没有中共党史，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那么党校还要不要开设党史课？今年七月十三日，王震同志和蒋南翔同志接见中央党校党史进修班学员时，他们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蒋南翔同志的答复是：党校的课程设置，是他和王震同志给中央写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发了中央文件的。那上面规定要开中共党史课。因此在中央没有作出改变的决定之前，仍要开设中共党史课。

上边谈了对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几点认识，可能是不完备、不深刻的。但是在学习开始的时候先谈一下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因为对重要性认识清楚了，自觉性提高了，就更有利于我们克服困难，拼搏前进。

下边简单谈一下这次进修班的教学安排和应注意的问题。（下略）。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几个问题

孙 良

建国初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党从夺取政权转为掌握政权；从进行革命战争转为治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转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个转折时期里形势十分错综复杂，各种矛盾都很突出，但是我们党的工作搞得不错，各种矛盾都处理得好，三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验也很丰富，是党史上工作搞得最出色的年代之一。研究这段历史及其成功经验，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怎么概括这个时期的历史，我们还缺乏经验。今天我准备讲四个问题：请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

- 一、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问题；
- 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和巩固；
- 三、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 四、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经验。

一、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问题。

首先要讲讲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建国以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党的一个根本任务、根本指导思想。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前后提法又不一致，思想上搞得比较乱，因此有必要对它作个说明。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特点。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共产党，从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遇到了如何处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阶级关系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系统地总结了建党以来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经验教训，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以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

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同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一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我们党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组织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了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从抗日战争结束到解放战争仅仅经过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是建立了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开辟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一九四九年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提出了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要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党的任务是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人民日报》报导全会的消息时,曾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就是要团结全国人民,“以便共同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而创造条件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九四九年六月《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毛泽东同志又多次讲到,要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此作为条件,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此可见,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指导思想,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新的伟大历史任务。

但是,从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把中国的过渡时期说成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以后,就再不讲我国社会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才又重新提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问题。

《决议》概括前七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也是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七年。《决议》的提法恢复了建国前直到一九五三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党内的一贯提法,即承认建国以后,我们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过三大改造,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我国社会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决议》的这种提法是实事求是的,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反映了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政策发展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根本线索。

根据上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来研究这七年的历史，在这七年中，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又可以分作两个不同的阶段。前三年是一个阶段，一般称作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三年中，又可以一九五〇年六月七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作两段。第一段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〇年六月三中全会以前。在这八个月中党的主要工作是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继续胜利进军，解放了西南、西北和华南等广大地区。到一九四九年底全部歼灭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军事力量，解放了除西藏外全部中国大陆。各级地方政权也随之逐步建立起来。党在经济上采取的重大步骤，就是立即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进行了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的斗争，取得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初步好转。三中全会后，全党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紧张的斗争，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经过了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到一九五二年底，即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胜利。

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和巩固

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政权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根本政治保证。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论文，阐明了我国政权的性质和政权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政权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这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那个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取得政权，只有掌握了政权，才有可能消灭剥削和压迫，建设社会主义。具体到我国来说，没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就谈不到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这是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

关于建国后我国政权的性质，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因为我国政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在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五一节的口号中，就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个号召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赞成。一九四九年六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具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我国统一战线的空前发展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由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

实行普选的条件还不成熟，这次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我们的国家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从这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来看，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他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但是，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由于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承担着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因此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实质上又起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民主专政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保证。因此，我以为建国初期的人民民主专政既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同时又起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完成，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具体形式。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逐步建立起来的。首先，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发展到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有一个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具体历史过程。政权建立了，能不能巩固，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历史上就曾有过不少先例，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却不能巩固这个政权，结果革命还是失败了。建国之初，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被打败了，但他们仍然虎视眈眈，企图卷土重来，复辟他们的反动统治。因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能够巩固胜利的党，建国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就成功地巩固了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在巩固政权的工作中，我们党十分注意作好经济工作。进城以后，我们党就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党的一项中心工作，并且提到了这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维持政权的这样一个高度。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正因为我们党在当时有着这样明确的认识，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同巩固政权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建国以后，我们党就紧紧抓住恢复国民经济这一中心任务，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一中心任务而努力工作。只有经济工作作好了，我们的基础稳固了，政权这个上层建筑也才能巩固。

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又是由于我们认真贯彻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

的原则，作好了团结人民镇压敌人的工作。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们党成功地组织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以后，我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并且扩大到包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内。在一九五〇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指出：“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旁，不要把他们推开。”三中全会又提出了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一方面我们党认真地作好统一战线工作，使得我国统一战线在建国以后，在反对国内外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我们党又开展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遗留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国外，我们又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争。这些斗争对于巩固和保卫我国新生的革命政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总之，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地建立起来了，我们党才有可能依靠政权这个武器，实现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

三、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恢复国民经济是建国初期党的一项中心任务。这也是我们要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问题。讲到国民经济的恢复，首先要着重研究一下党的经济政策，党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和根据地的建设中逐步形成和具体化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针，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1934年1月《我们的经济政策》）可见，早在二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已经指出了根据地经济组成的三种成分，规定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并且考虑到了在民主革命时期就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同时指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内部应该建立的经济关系，即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到解放战争时期，当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胜利在望的时

候，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具体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阐明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到了新中国建立前夕，我们党更加注重研究经济问题。一九四八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写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提纲》。九月，张闻天同志为东北局起草并经东北局常委讨论通过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些文件进一步研究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正是经过了这样长期历史发展和充分的准备，在这个基础上，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式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经济政策。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准备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全会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指出这是我们决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全会指出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认清中国经济的这个基本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对中国经济要心中有数，百分之十与百分之九十，才能全面了解。陈独秀看不起百分之十的数字，看不起无产阶级，因此右倾，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内战时“左”的错误，没有看到百分之九十，也是心中没有数。

全会分析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它肯定了张闻天同志在东北经济建设提纲中首次提出的五种经济成份，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全会又规定了对五种经济成份的不同的政策。明确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对它必须利用，这是因为私人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占了现代工业生产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政治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限制，在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又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的状态，因此，在革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对私人资本主义又必须加以限制，因为我们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决不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又必须加以限制，全会规定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几个方面进行限制。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多种方式上的反抗的。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全会预见到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上升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既要反对不要限制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又要反对过分限制以至马上消灭私

人资本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

全会强调对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全会深刻地阐明了发展合作社经济的重要性，指出了它在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原则上提出了要通过以私有为基础的合作社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毛泽东同志在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

在深入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成分并制定了对它们的不同政策的基础上，党在原则上已预见到：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力量，发挥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将个体经济逐步引上集体化的道路，有限制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将它们逐步引向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我们就能够将上述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平地改变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

在全会的总结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可能性完全存在，当然党若腐化起来，不但不能巩固领导权，要犯大错误，要翻筋斗。”还说：“二中全会我们是有准备的，中间还有困难，过去有准备夺取了半个中国，现在有准备要夺取中国，只要不糊里糊涂，我们一定要胜利。”

总起来说，我们党规定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仍然是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方针。因为它仍然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在一定范围的发展。但是，它又是能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它依靠合作经济作为自己的助手，领导小农经济，它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是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继续和发展。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方针。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建国以后，党在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胜利。在建国后的三年内，党成功地把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且恢复了国民经济。贯彻执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党在经济战线上主要作了以下几件工作：

首先，随着革命的胜利发展，大、中城市的解放，党立即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党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明确规定，派人去接收官僚资本企业时，“必须严格地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而是把它完整地接收下来，先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这同对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是有原则区别的。对后者应该彻底加以破坏，不能利用。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到一九四九年底，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达2,858个，拥有生产工人75万多人。一九五一年一、二月，政务院颁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和《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清理了隐藏在一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股份和其他应没收的财产。这样，就彻底完

成了没收旧中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全部官僚资本。在这过程中，由于执行了中央不打乱企业组织机构的政策，就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或企业设备被毁坏的现象，并且使原来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基本上都保留下来，继续为生产服务。

第二、反对了资本主义的投机势力，进行了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统一财政经济的工作，树立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争取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初步好转。

建国之初，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很困难的。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加上连年不断的战争，使我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与历史上最高年份相比，粮食和大豆降低了25%，工业生产降低了50%。工农业生产极端衰落。再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使物价飞涨，投机资本十分猖狂。在这种情况下，连正当的工商业者也不得不以主要力量去从事投机活动。另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军，人民政府要保证九百万军队和公职人员的供给，又要恢复生产和交通，财政收支不能平衡。一九四九年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陈云：1950年4月13日讲话）

在这种情况下，投机资本乘新生的人民政权存在困难之机，采取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方式，兴风作浪，疯狂地追逐暴利，扰乱市场。一九四九年全国物价就发生四次大幅度上涨。当时，稳定市场，控制物价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首要条件。为此，我们党进行了打击投机资本、统一财经两次重大工作。

陈云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到达上海，调查研究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问题。陈云同志认为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陈云同志亲自主持，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歼灭性打击。一九五〇年三月，全国市场物价就完全稳住了。从此，投机资本的冒险被彻底击败，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后遗症也被迅速消除，这一胜利成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前奏。这一胜利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取得了市场的领导权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标志。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这一胜利，指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是同全国财政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相结合进行的。从抗日战争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二年间，适应解放区被分割的状况，我们实行的是政策上统一领导，业务上分散管理的方针，曾经取得了极大的成效。随着全国大陆的解放，形势的改变，我们的方针也必须改变。国家必须统一管理财政经济工作。陈云同志说：“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这样，不但有害于战争和军政人员的供应，而且有害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陈云文稿》第71页）早在一九四九年冬党中央就确定了全国财政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的方针。一九五〇年三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的基本内容有三：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个决定实